



儒佛融通的文化須再積極推廣·創造

·趙曾珏

中華文化之復興大業，正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能執其要端，條理融會，挈綱揭領，其唯儒道與佛教之大乘佛法。「慧炬」雜誌獨能揭櫫儒道與佛教為重點之發揚，領導吾國大專青年學子入于正軌，照周宣德先生之估計，影響所及，前後至少接引有十萬青年以上，這是一種裨益社會的偉大工作。目光遠矚，早為學者所欽崇與樂道，值此二十五週年紀念，謹就管見所及，不揣冒昧，謹廣其義，而祝其前途之無量遠大。

一、提綱

吾國文化之大本，莫過于大學首章所提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正是說明了最崇高的文化之道，在于闡明「明德」。這「明德」可說包涵了天下為公，即孔子所主張的禮運大同章，即無私、無偽、無欺、無疑，以恢復「人性之天然」。所以接下起說「在親民」，即是在親愛百姓，而推廣至于全球及全人類，使得人類得到可愛的社會，享受最好的生活，即「止于至善」。

佛教的精髓所在，可從大般若經所指「與一切智」智相應，以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一切智的智是佛的智，佛的智著重在「制心」，調伏自己的心。般若經云：「於一切法，心為前導，若能知心，悉知衆法，種種世法，皆由心造。」「與一切智智相應」一句，正與「在明

明德」相稱。而接下，佛說「以大悲為上首」，即就是說「以拔衆生的苦為首要」與儒家說法，「在親民」無異，以無所得為方便。無異的說，「忘記了我自己，不為己利，天下為公。」亦即是至善的境地。

由以上儒、釋兩道的最高的綱領看，可說儒家的一串原則和佛家的一串原則可以貫通貫串融通。茲再從日常生活中闡述之。

二、儒佛在日常生活中

吾中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獨特的地方，為全球所公認而讚美的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孔子禮運大同章，更說明社會、家庭、少長、老幼，各得其所，祥和的安插福利，並達成優良的倫理，實基於「四維：禮、義、廉、恥。」及「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其中最難得的乃是一個「忍」字。忍字從「刃」從「心」而成。這是說一把刀在心上而能泰然處之。因為能忍，就能作「易地而處」的想法，就能設身處地，了解對方，銷弭爭執，和平相處。在佛教中說：「若以靜止靜，畢竟不得止，唯忍能止靜，是法真尊上。」（至于佛教的提倡孝道只須讀地藏經，即可見之。）

再說吾國賢達提倡，接人待物的態度，如崔子玉的座右銘所說：「施人慎弗念，受賜慎弗忘。」第一句，可是

實與佛法所倡「無相布施」的意義相符。其第二句亦適與佛教所倡「報恩」的意思相符。但在佛法中，有財施、法施及無畏施。財施者以財物施人，為最淺近者。法施者以大義開導他人，在儒學中則在在皆是。這法施比財施更廣大或更有意義。而無畏施則以身獻國，或為社會國家而有所發明，有利人群，如愛迪生之發明電燈，使世界俱得光明，是一種無畏施。更有進者，若吾人服務社會，或在生產機關做工，所得酬勞或不及吾人出腦力或勞力之所值。這種情形，如國營事業，或私營工業並不剝削勞務者而力求與世界市場競爭，薪工較少部份，可說施之於社會，以求生產品成本可低，爭取世界市場之地位。佛教可使吾人有平心為公精神，這是服務的成員，不但得到科技之「智」，抑亦獲到科技之「慧」。而西方國家所不能及。寶藏經說得最透澈：「無怨恨之教，是為佛教；無諍訟之教，是為佛教；無誹謗之教，是為佛教。」，信然。

三、儒佛在國家社會中

至于「平等」「民主」在佛教與儒道，均倡導深切顯著。華嚴經云：「大海水一，而波濤現千萬形，於水無別也。如太陽無雲翳，普照十方，光明無異性。諸佛之法亦如是也。」法華經云：「吾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無種族、無尊、無卑、無男、無女，各守自端，平等，平等。吾國的儒家，早已有民主的思想。如大學之道所示綱要，但孟子更說得直捷痛快：「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說，人民的意見，不可忽略，正如天的意思。在佛法和儒道有一樣的想法：天下事無有不可和平解決者，則須持平、公正和民主化。

儒家更有進一層的思想，就是：「民我胞也，物我與

也」的「胞與」思想，即化除人與人之對立，人與物之對立，而認為人、我一體，物、我一體，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一。」恰與佛教的緣起法的要旨相符。緣起法簡言之，就是說明人們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個人不能獨立生存，須團結互助，合作無間。故不論儒、佛，對於人心之啓發，須自內流出，源源不息，推廣自己之德性，並啓發他人之德性，而交感融合，以期整個世界人類能欣欣向榮。這就是「儒佛交融的文化」。

四、西方的文化

讀西洋史，可知埃及、希臘曾被稱為西方古代文明的國家。但古代埃及注重實務的天文知識，改正歲時差度，採用「太陽曆」（即現在大眾所採用的陽曆），並未作進一步之系統研究，作抽象的思考。惟希臘人則不然，他們具有哲學思想，且對遙遠之天體運動，作種種之臆測，其哲匠之多，不勝枚舉。筆者姑舉希臘最早哲學兼數學家畢泰哥拉斯（Pythagoras, 582-500 B. C.），他的學說成爲一派，主張一切變化的現象背後，必有其不變的根源，唯一不變的根源，止有「數」爲萬物的原理（這好似東方哲理，發現萬物之基爲「本性」）。數是抽象的，超感覺的。畢氏之此一提示，對於自然哲學，影響甚大。這是西方自然科學家對於「數理觀念」的始基。因之，西方自然科學家從希臘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以至於近代哲學、科學家如法之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德之萊布尼茲（1646-1716）及英之牛頓（Newton, 1642-1727）等，都認為大自然的本身有其內在的定律，或稱「自然律」爲一神所安排的信念。所以西方的哲學不再費腦去從內觀照，而側重於向外探討。此後，自五世紀羅馬帝國的崩潰至第十世紀，

歐洲經過一個黑暗時代，中世紀有教會的統制思想，文化低落，直至文藝復興，思想解放。西方的文化，在近三四百年間，有高速度的發展，雖有若干人文科學的成就，但它們的質量竟不如物質文明的成就，茲再分述之。

在十六世紀的開始，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首先觀察出來我們的地球是繞著太陽旋轉的一顆行星；繼之以德國的天文學兼數學家開普勒（Kepler, 1571-1630）進一步的確認地球在天體運行的軌道並非圓形而是橢圓形的；意大利的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發現物理運動，不拘體重，總是以相等的速度落下來。迨至英國的物理學及數學家牛頓（Newton, 1642-1727）而集大成，他綜合開普勒的天體三大定律，及伽利略的物質下墜律，倡導「萬有引力律」。牛頓認為一切天體的吸引力與推拒力，離心力與向心力，都是相互抗衡，各以其獨具之質力，抵禦外在所加之脅迫力。因此每一物體如要保持其自身發展，勢非發揮其自力以對抗外力不可。到了十九世紀中，達爾文（Darwin, 1809-1882）創導「生物進化論」闡述生物為適應其環境，以求生存，不得不注意對外力之抗衡。由於此論之推想，使人類對於未來之生命充滿著熱情、恐懼與緊張。一般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莫不表現其強烈的「奮鬥力」與「征服慾」。如一九六九年，美國的太空人登上了月球，大眾高喊著「征服月球」的口號。若這種心理表現於社會形態、政治心理、生活情調，及民族氣焰，則整個世界必陷於永久的矛盾，或對立的情態中，這是西方文化的缺點。

結論

以上所述西方文化的缺陷，已到了一個嚴重時期。有

識之士，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已感到其本國文化，富於物質的文明，而短於精神的薰陶。美國的科學雜誌 Science 已於今歲發表了好多關於日本工業之勞資和諧合作與其管理方法的特質，使其生產品，質地高而成本降低，奪了美國國內市場，以至使八十年代美國之進出口逆超，累積已達兩千億美金之鉅。其故無他，乃由于日本早已獲得我國傳去的「儒佛之慧」，配合西方「科學之智」。其第一著：以此文化建立日本的，於一九六八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政治；第二著：幫助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後的日本，促進了她「智」「慧」雙全的工、商業及管理。當然日本人的毅力實行，及團結合作的精神，亦不可不嘆佩。

現在姑不論歐洲各國亦有同樣的感觸而求改善。美國的工商界和教育界已漸有此覺悟，但他們感到要效法日本並非易事，乃是一個長期的計劃，須從教育著手。現在的初步策略，美國著名的大學中，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本薛文義大學，西海岸的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等，早已設立東方哲學等科系，研講儒學與佛法。但在中等學校，於每學期中於比較宗教一課中亦有計劃的邀請美國的佛教團體，前往講演儒道及佛教的要旨，惟需用英文，於講後由學生提出問題討論。作者不敏，亦曾多次被邀，深感學生與教師發問與領會答覆之熱烈情緒與興趣。

慧炬雜誌實為我國提倡儒、佛文化之大本營，數十寒暑之苦心孤詣，其效漸見，在國外的學人莫不感到。值茲成立二十五週年銀慶之日，除感謝其為我國文化主流推進之熱誠和成功，特以此祝社務發展更上層樓，將儒佛融通的文化，在國內更加強，在國外更推廣，以促進東西文化的配合發揚，以臻世界之和平康樂。

一九八六年，雙十節于美國佛教會